



宋代仿古瓷器的原型與功能—— 以瓷簋作為主要觀察對象

■ 雷皓天

宋代仿古器的興起，反映了宋人對於「古典」與「再現三代」的渴望，這其中，執政者企圖藉由製作復古三代器樣的禮儀用器，來表現天子與諸侯間對理想政治的嚮往；文人雅士們則是藉由對古器物與仿古器的追求，來展現特有的生活品味與士大夫階級獨有的身分符號。¹在此脈絡之下，歷來學界較集中關注青銅器類在古器物收藏與仿古器製作上的接受狀況，對於仿青銅器樣式的陶瓷器研究，至今多僅依附於青銅器的研究觀點下被簡單地提及。而有關於仿古陶瓷器在樣式的選擇以及使用脈絡的考察，受限於陶瓷研究與青銅器研究在學科領域上的分野，目前相關的討論仍較少展開細節上的比對。

多數的宋代仿古陶瓷器，會被直接與《宣和博古圖》中的青銅器樣式進行連結，不論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定窯〈獸耳瓦紋簋〉、²南宋官窯〈青瓷簋〉³或是南宋官窯窯址的出土品，都曾有相似取徑的討論，並被視為某種「官樣」的傳承與延續。⁴本文將聚焦於帶有鼓腹、雙耳、圈足器形特徵的仿古瓷器作為觀察對象，該器式在宋代文獻中，曾被以「彝」、「敦」、「簋」三種方式稱呼，以下陳述將以現今學界慣用的「簋」來表示。⁵希望藉由分析宋代瓷簋與《宣和博古圖》、《考古圖》間的樣式異同，來辯證仿青銅器造型之瓷器應有其超越官方樣式的學習對象，及其迥異於仿古青銅器的接受脈絡。

十一世紀中至十二世紀初期仿青銅簋之陶瓷器與博古圖式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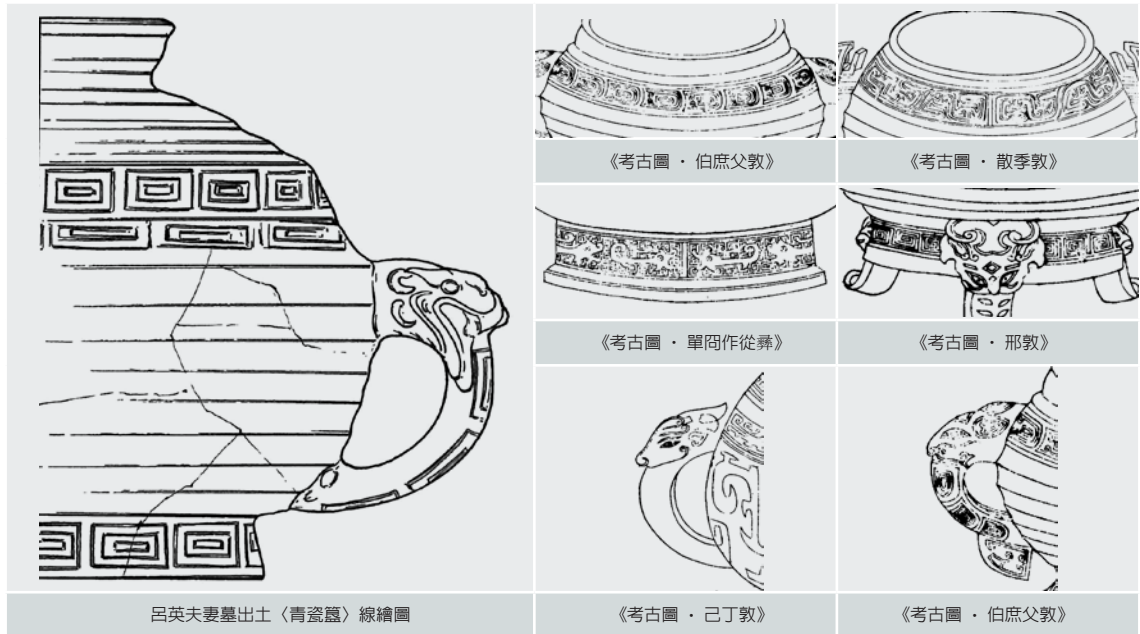
目前可見以「簋」作為模仿對象的瓷器，最早應是陝西呂英（994-1050）夫婦墓出土的耀州窯〈青瓷簋〉（圖1），該墓瘞埋於嘉祐六年（1061），早於官方編撰《宣和博古圖》（1123）的成書時間。於此，許雅惠認為該件作品是「仿自西周銅簋的瓷器」，可能是以《考古圖》所記呂氏家族所藏「散季敦」，又或是以其他宋代收藏家的青銅簋作為借鑑對象。⁶若以宋人的角度來思考，當時的收藏家對於商周或春秋戰國青銅器的風格特徵，實際上並未有著明確的認知分野，對於該件耀州窯〈青瓷簋〉所形塑的仿古樣式，應是在配合宋代文人所推崇的玩



圖1 嘉祐6年葬 耀州窯 青瓷簋 M9:14 陝西藍田呂英夫妻墓出土 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歷史博物館編著，《藍田呂氏家族墓園·第二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頁454-456。

表一 呂英夫妻墓出土〈青瓷甌〉與《考古圖》中類似樣式的「敦」、「彝」器之比較

作者製表



參考資料：《考古圖》圖像擷取自（北宋）呂大臨編撰，《汜如齋重修考古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2003，明萬曆年間刻本，頁113、125、133、169、219。

古風氣下，才推使瓷器作品中出現借鏡古器物風格的新樣器類。⁷

延續此脈絡，如比對《考古圖》中所記銅「彝」與銅「敦」的造型可以發現，本件耀州窯〈青瓷甌〉的製作，並未使用呂大臨（1040-1093）所記二十四件青銅簋的器樣來進行直接的翻樣複製。（表一）諸如在珮的樣式中，《考古圖》可見無紋、未帶珮的「己丁敦」，也可見滿紋、帶珮的「伯庶父敦」，然而，耀州窯〈青瓷甌〉不論在獸首抑或紋樣的選擇上，皆未展現對任一青銅器樣的仿製。而在圈足部分，《考古圖》中繪有三足與未帶三足的兩種類型，其中圈足紋樣較為簡單、幾何化的樣式，多出現於三足簋器，相較之下諸如「單罔作從彝」等圈足簋，則多在圈足處進行較複雜的紋樣裝飾，未發現與耀州窯〈青瓷甌〉類似的設計。

而就口沿與圈足處的幾何形紋樣來看

（表二），「伯庶父敦」呈類似重環紋的紋樣，「散季敦」呈竊曲紋樣，「邢敦」則呈方形漩渦紋，三者皆與耀州窯〈青瓷甌〉上的回紋裝飾有著顯著差異。若對同時代的回紋裝飾進行考察則能發現，此類紋樣多出現於銅鏡、壁畫、磚雕中所繪製的仿古器中，不排除當時曾被視為搭配仿古器的流行紋樣來進行使用。

另外，我們也可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定窯〈獸耳瓦紋簋〉中得到相近的觀察。（表三）其口沿處以回型與同心圓線組成的紋樣無法從《考古圖》或《宣和博古圖》中找到一致的案例，類似間隔以同心圓的佈局僅能從「隴彝」與「商虎首彝」中發現；而定窯簋足部長型回紋的安排，則僅能從「彝敦」與「周刺公敦」找到大致相近的樣式；在雙耳的部分定窯簋豎線裝飾的安排，與「周仲駒父敦」相近，而強調獸首口銜之姿則與成書時間稍晚的《續考古圖》中

表二 呂英夫妻墓出土〈青瓷簋〉器身回字紋樣比對

作者製表

簋上幾何紋樣			
			
耀州窯〈青瓷簋〉口沿與圈足處 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歷史博物館編著，《藍田呂氏家族墓園·第二冊》，頁254。	「伯庶父敦」口沿處 取自(北宋)呂大臨編撰，《汜如齋重修考古圖》，頁133。	「散季敦」口沿處 取自(北宋)呂大臨編撰，《汜如齋重修考古圖》，頁113。	「邢敦」圈足處 取自(北宋)呂大臨編撰，《汜如齋重修考古圖》，頁125。
			
宋 銅鏡器表紋樣拓片 局部 武進縣博物館藏 取自夏星南，〈介紹江蘇武進縣博物館藏的一件宋代銅鏡〉，《文物》，1993年8期，頁47。	遼 墓室北壁壁畫局部 河北宣化遼金壁畫墓出土 取自寇振宏、王鵬、馮淵淵、韻文婧，〈河北宣化遼金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年3期，頁36-48。	北宋晚期 墓室東北壁 離磚拓片 局部 洛陽洛龍區關林廟M3墓出土 取自張瑾、周立，〈洛陽洛龍區關林廟宋代磚雕墓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8期，頁31-46。	

的「寶敦」相似；⁸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寶敦」在垂珥處表現內側寬度較寬、外側較細的設計與定窯〈獸耳瓦紋簋〉相似，不過，若就定窯簋垂珥側面局部來看，垂珥較細處選擇以「口」字型向耳部連接的做法（圖2），是為平面印刷品中所未表現出的造型樣態，展現出了窯工或訂製者對立體成型的想像與設計巧思。

綜合以上觀察可以知道，當時製作耀州窯〈青瓷簋〉與定窯〈獸耳瓦紋簋〉的製作者，應並非以相關古銅器圖錄作為直接翻製的母本，其在紋飾的設計上也與典型商周銅器有所區別。取而代之的，從器物整體風格的表現來看，似乎更應被認識為，以古典樣式為基礎，在多樣的銅器造型與紋飾表現中，經由不同程度的重組與再創造，配合陶工或訂購者的審美選擇，企圖表現青銅器轉化為陶瓷器後，獨具宋代審美風格的瓷簋新樣式。而這即與官方製作青銅

器強調對古代樣式的忠實還原有著顯著的區別，重組與新創的設計選擇，更多層面展現了使用者對仿古陶瓷器作為禮儀用器外的賞玩態度，與宋代文人對古器物收藏的「玩古」精神有較緊密的連結。⁹

除陶瓷器外，同時期石簋的製作也展現出了與商周青銅簋在樣式上的差異。（表四）從呂氏家族墓出土的三件石簋來觀察，古銅器圖錄中的青銅器多做獸首銜耳，並附有垂珥的裝飾，¹⁰此三件石簋除皆未進行此種安排外，另選擇將商周青銅器原多鑄刻於器內或器底的銘文，刻意地轉安排至較易被欣賞的器物表面，可見製作者有意識的想與古器物形象做出區別。如再就原於徽宗朝任職道士官的閻德源（1069-1165）墓出土石簋來看，¹¹以大型的方形回旋紋樣作為主題裝飾的表現，至今從未於古銅器圖錄或商周銅器中見到同樣的佈局，並且該件石

表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定窯〈獸耳瓦紋簋〉與《考古圖》、《宣和博古圖》相似器樣對比

作者製表

	 <p>《考古圖·陽彝》</p>	 <p>《宣和博古圖·商虎首彝》</p>
	 <p>《考古圖·彝敦》</p>	 <p>《宣和博古圖·周刺公敦》</p>
	 <p>《續考古圖·寶敦》</p>	 <p>《宣和博古圖·周仲駒父敦》</p>
	<p>北宋 定窯 獸耳瓦紋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7793</p>	

資料來源：《考古圖》取自（北宋）呂大臨編撰，《汴如齋重修考古圖》，頁121、233。《續考古圖》取自（宋）趙九成，《續考古圖》，收入呂大臨等著，《考古圖：外五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清乾隆年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434。《宣和博古圖》圖像取自（宋）王黼等編，《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元至大間刊，明修補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善014552~014575。



圖2 北宋 定窯 獸耳瓦紋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7793

簋選擇淡化青銅簋圈足的特徵，而另強調瓷簋中所未出現的青銅簋三足造型，應可作為與上述宋代仿古器之製作者，依其審美喜好或訂購者的使用要求，所創作出宋代新式青銅器仿古風格的概念延伸。

南宋官方窯口製作的仿青銅瓷簋與博古圖式的關係

過往研究者多因史料記載，強調仿青銅器陶瓷應是作為趙宋南遷後在祭祀場合中，為取代未能帶至南方的青銅器，以其作為替代品使用的禮儀用器。¹²而作為南宋官方窯場的杭州老虎洞、烏龜山

表四 南北宋之交仿青銅器造型之石簋

作者製表



北宋 石簋 M4:18 呂景山夫妻合葬墓出土（1111）
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歷史博物館編著，《藍田呂氏家族墓園·第二冊》，頁341-342。

北宋 石簋 M26:10、M26:19 呂義山夫妻合葬墓出土（1102）
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歷史博物館編著，《藍田呂氏家族墓園·第三冊》，頁797-798。

金代 石簋 大同金代閻德源墓（1165年葬1190年立碑）出土
取自解廷琦，《大同金代閻德源墓發掘簡報》，頁1-7。

窯，若考慮到前段所述北宋瓷簋在紋樣與造型上的複雜選擇脈絡下，對於南宋官窯瓷簋與《宣和博古圖》所編定的官方樣式間的關係，以及其是否能符合朝廷內禮儀模式中被作為青銅器替代品的使用原則，似乎可以被更詳盡的檢驗。

過往如森達也、蔡和璧等多數研究者基本認為，南宋官窯製作的青瓷鼎、簋、觚、尊、貫耳壺等仿青銅器器群，應具有作為禮儀用具的使用方式，並且其樣式應是學習自官方編訂的《重修宣和博古圖》而來。¹³就本文關注的簋形器來看，目前窯址出土品與博物館收藏的南宋官窯青瓷簋共有兩種器式。（圖3、4）二者迥異於仿古青銅器在紋飾上對商周器的學習，南宋官窯主要企圖追求薄胎厚釉的青瓷表現，故大多數仿古器並未進行紋飾的安排或僅以弦紋裝飾。如再就圖3烏龜山窯址出土〈青瓷簋〉雙耳造型觀察，可見其嘗試簡化原青銅簋耳部常見的獸首與垂珥造型，已與典型的商周風格相距甚遠。綜合來看，南宋官窯青瓷簋不論在造型還是紋樣上的表現，似乎皆與史料中提及國子監丞王普等人對禮儀用器需「宜並從古器制度為定」的嚴格要求有所出入。¹⁴

如再就南宋中晚期製作的龍泉窯青瓷簋來

看，研究者普遍認為，龍泉窯應曾有作為宮廷貢瓷窯場的可能性，並學習了承載南宋「官樣」意識的《重修宣和博古圖》中的器物樣式，¹⁵不過有趣的是，在目前可見的龍泉窯仿古瓷簋中（圖5、6），仍尚未出現與南宋官窯或商周青銅器完全一致的作品。就金魚村窖藏與湖州市博物館藏的龍泉窯簋分析，可以發現兩者雖在器身上與南宋官窯皆採取無紋的裝飾選擇，不過，在雙耳造型的安排上，十三世紀三〇年代入窖保存的金魚村窖藏龍泉窯〈青瓷簋式爐〉，¹⁶則選擇強調南宋官窯青瓷簋所沒有的獸首翹唇造型，而南宋晚期的湖州市博物館藏件則是比起烏龜山窯〈青瓷簋〉更簡化了雙耳的獸首與垂珥的表現模式，這些裝飾都與原本的青銅器祖型或所謂「官樣」原型相距甚遠。

若將上述南宋官窯與龍泉窯青瓷簋的造型樣式一併觀察，南宋由政府所主導的仿古陶瓷器製作，其設計理念應與北宋耀州窯〈青瓷簋〉以及定窯〈獸耳瓦紋簋〉有著相似的製作脈絡。不論是北宋文人抑或是南宋官方，二者間對於仿古瓷簋在器形與紋樣上的選擇，皆與仿古青銅器對商周樣式高度還原的設計理念有著顯著的不同。若結合唐俊傑曾認為南宋官窯仿古器



圖3 南宋 官窯 青瓷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1438

應是作為陳設器的看法來考慮，¹⁷南宋仿古瓷器比起作為實際的禮儀用器，其所展現超越古典樣式外的審美選擇，應較近於北宋文人看待仿古器的「玩古」態度。

結論

綜合本文考察，仿古瓷簋在紋飾與造型上，表現出迥異於商周青銅器與古銅器圖錄內的樣式。如在耀州窯〈青瓷簋〉的案例中，可以見到北宋流行的回字紋加入；在定窯〈獸耳瓦紋簋〉中，可以見到製作者立體化平面印刷圖版的想像；在南宋官窯與龍泉窯的案例中，可以見到受「官樣」影響的官窯與貢窯，展現對瓷簋追求薄胎厚釉的無紋或僅有弦紋的選擇，並開始統一在瓷簋上配置垂珥的表現；而在龍泉窯的案例中，更可以見到南宋中晚期，對於雙珥造型的誇飾與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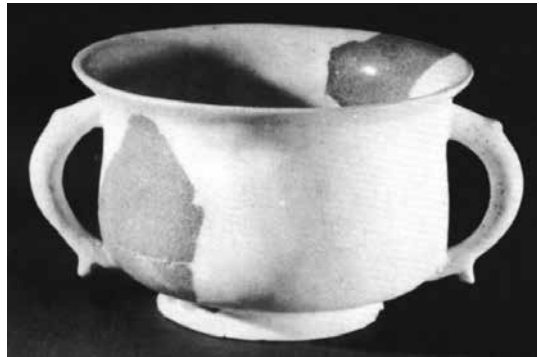


圖4 南宋 官窯 青瓷簋 烏龜山窯址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園林文物局編，《南宋官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圖版二十一。

在這個脈絡中，青銅簋的基本造型，只是作為南北宋瓷簋承載不同選擇的載體，雖然僅就大致的外觀樣式來看，會被直觀的歸入「仿古」器內的文化認知，但實際上，在鼓腹、雙耳、圈足器形的主體下，展現了訂購者與製作者有意識的選配與重組。¹⁸



圖6 南宋 龍泉窯 青瓷簋式爐 金魚村窖藏出土 取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遂寧市博物館編著，《遂寧金魚村南宋窖藏·下》，圖版六。

而此類瓷簋與簋形器在南北宋時期的使用脈絡，若從北宋呂英墓的出土情況來思考，以耀州窯〈青瓷簋〉為例的陶瓷仿青銅器式，應曾受文人、士大夫所喜愛，除可能於日常生活中實際使用外，¹⁹ 也曾以此類器式作為陪葬所用。

另就閩德源墓出土石簋，以及南宋智標塔址出土銅簋來看，二者內部皆保有原放置香灰的使用情況，²⁰ 可以推測簋形器或許曾作為香爐使用。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宮廷畫家所繪《書畫孝經冊》圖中的簋形器（圖7），其內置匕或勺的組合，也可推測簋應曾作為香爐或酒器來使用。此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印花博古圖分格花口盤〉中，更繪製有以簋做為盛花器使用的案例。（圖8）而在山西聞喜寺底金墓壁畫中，也可發現將帶有獸首雙耳的三足簋，與「孟宗」哭竹的場景進行組合（圖9），可以



圖6 南宋 龍泉窯 雙耳簋式爐 湖州市博物館藏 取自朱伯謙主編，《龍泉窯青瓷》，臺北：藝術家出版，1998，頁154。



圖7 13世紀 《書畫孝經》冊 第5開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224



圖8 金 12至13世紀 定窯 印花博古圖分格花口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4223

知道，當時簋形器的使用應相當廣泛且用法多元。

經由上述的討論，可以知道仿古瓷簋在宋代應有著多面向的使用方式，而不論就其在紋樣、造型的配置上，皆與官方編撰的《宣和博古圖》以及仿古青銅器有著顯著的差別，此類瓷簋的製作與認識，應能將其排除在宋代具有嚴格限制的「官樣」系統之外，與此相應的，以其作為祭器或禮儀器的可能性應也較低。而若基於本文對宋代仿古瓷簋的重新觀察下，以青銅器祖型作為載體的仿古瓷器，其所表現新創的選擇與紋樣重組的設計理念，或許應更貼合自北宋文人開始，在古器物收集上所欲強調生活品味與文化階級的玩古精神。

本文的撰寫感謝吳曉筠教授指導，與審查老師所提供的研究建議。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圖9 金 山西聞喜寺底金墓壁畫 取自李全叔，〈山西聞喜寺底金墓〉，《文物》，1988年7期，頁67-73。

註釋：

1. 陳芳妹，〈宋代「金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收入陳芳妹，《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臺大出版社，2016），頁22；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人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收入陳芳妹，《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頁94。
2. 本件定窯簋被認為可能是以《宣和博古圖》等所載錄器物依樣摹製的，並以「周處敦」、「周師望敦」作為舉例。謝明良，〈定窯筭記——項元汴藏樽式爐、王鏞藏瓦紋簋和乾隆皇帝藏定窯瓶子〉，《故宮文物月刊》，377期（2014.8），頁50-61。
3. 本件南宋官窯（青瓷簋）被認為是以《宣和博古圖》作為重建當時禮制器用的典範，並以「商父丁彝」、「商鬲彝」作為舉例。余佩瑾，〈南宋官窯青瓷簋〉，收入余佩瑾主編，《貴似晨星——清宮傳世12至14世紀青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68-69。
4. 蔡玫芬，〈官府與官樣——淺論影響宋代瓷器發展的官方因素〉，收入林柏亭主編，《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321-337。
5. 此種造型特徵的器物，在宋代《宣和博古圖》、《考古圖》與呂景山夫妻墓出土自銘簋中，則曾各被以「彝」、「敦」、「簋」三種方法稱呼，就先今青銅器的考古材料能知道，青銅「敦」多進行圓腹、環耳的造型特徵，而「彝」今日則被作為泛指各式青銅禮器的代稱，與本文所指涉的器形樣式有所不同。故，本文的撰寫將統一以「簋」來進行稱呼，若遇古籍文獻中對此類器種的不同稱謂，將另以引號標示。針對此類器種在宋代的命名討論，可詳見張莅，〈「鑑古——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特展介紹〉，《故宮文物月刊》，453期（2020.12），頁11-13。
6. 蔡玫芬，〈自然與規範：宋、金定窯白瓷的風格〉，收入《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281；許雅惠，〈宋代士大夫的金石收藏與禮儀實踐——以藍田呂氏家族為例〉，《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第三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頁131-164。
7. 此處的觀察，以及本文對宋代文人玩古風氣的關注，感謝審查老師的提示。而對於本件耀州窯（青瓷簋）應是在宋代文人玩古風氣下所製作出的看法，可見森達也著，王淑津譯，〈宋代定窯白瓷的歷史定位——與汝窯、南宋官窯之比較視點〉，《故宮文物月刊》，368期（2013.12），頁18-29。
8. 《續考古圖》的成書時間，根據許雅惠的考察，最可能是於北宋崇寧四、五年（1105-1106）之間。詳見許雅惠，〈北宋晚期金石收藏的社會網絡分析〉，《新史學》，20卷4期（2018.12），頁86-90。
9. 在陳芳妹的文章中，闡述北宋中期開始，文人士大夫階級開始有將古器物作為「玩物」的態度。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人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頁97-99。
10. 《三禮圖》中「敦」與「彝」共計24件簋形器中，僅有「從彝」未作獸首銜耳造型與垂珥。《宣和博古圖》共計49件簋形器中，全部皆是以獸首銜耳作為裝飾，未作垂珥的僅有5件。
11. 解廷琦，〈大同金代閻德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4期，頁1-7；在陳雲倩的文章中有特別強調閻德源作為道士，其與當時皇室的緊密關係，詳見陳雲倩（Yun-Chiahn C. Sena）〈南宋墓葬與窖藏中的仿古器（Archaistic Objects in Southern Song Tombs and Caches）〉，《美術史研究集刊》，38期（2015.3），頁73-74。
12. 多數學者支持南宋官窯與寺龍口越窯所製作的仿青銅造型的陶瓷器是被作為當時青銅器替代的禮儀器來使用，詳見森達也，〈汝窯與南宋官窯——技術と器種の比較〉，收入森達也，《中國青瓷的研究——編年と流通》（東京：汲古書院，2015），頁93-114；蔡和璧，〈南宋皇室官家祭祀與官窯器〉，收入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編，《南宋官窯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1-13。
13. 宋室政權在受金人所迫而南遷杭州時，散失了原於徽宗朝所編定的《宣和博古圖》冊，一直到紹興十年（1140）年才重新求得，其增補後的版本後稱《重修宣和博古圖》，詳可見韓巍，〈宋代仿古製作的「樣本」問題〉，收入中國國家博物館主編，《宋鈞——四川窖藏文物輯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291。
14.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清乾隆御製重刻本），卷74，頁681。對南宋仿古器製作樣本問題的研究，詳可見韓巍，〈宋代仿古製作的「樣本」問題〉，頁288-296。
15. 蔡玫芬，〈官府與官樣——淺論影響宋代瓷器發展的官方因素〉，頁321-337。
1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遂寧市博物館編著，《遂寧金魚村南宋窖藏·下》（北京：文物出版，2012）。
17. 唐俊杰，〈祭器、禮器、「邵局」——關於南宋官窯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刊》，2006年6期，頁45-60。
18. 相類似的研究取徑可以參考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在討論漢字模件化的字體組建模式，僅是不同瓷簋在製作時所參考的選擇更為多元。雷德侯著，張總等譯，《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23-25。
19. 許雅惠的文章中曾提到，呂英墓出土耀州窯青瓷簋，應曾為墓主人生前實際使用過。許雅惠，〈宋代士大夫的金石收藏與禮儀實踐——以藍田呂氏家族為例〉，頁131-164。
20. 曹錦炎、張鎮西主編，《海寧習標塔》（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64。